

# 郑观应关于“商战”的论述与国防经济思想萌芽

INTELLECTUAL RUDI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ECONOMY INDUCED  
FROM ZHENG GUANYING'S DEMONSTRATION OF BUSINESS WAR

□ 陈海涛 黄宁辉

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中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实业家,也是“商战”问题的系统论述者。在其脍炙一时的著作《盛世危言》中有专论商战2篇,商务5篇,商船2篇。长期以来,关于郑观应商战思想的研究资料较多,但往往是立足于其“富国”的一面,而对“强兵”一面重视不够。鉴于郑观应商战思想是在国家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与军事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拟从国防经济角度出发,重新挖掘其思想的另一部分。

## 一、基于经济安全的国防安全观

与同时代一般人着眼于政治和军事不同,郑观应着重揭露了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危害性。他认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根本目的是借战争或和平的手段进行经济掠夺,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这是不如战争手段易被察觉的。郑观应通过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兵战”、“商战”和“传教”三种侵略方式的比较,认为经济侵略是最危险的一种方式。

他在《盛世危言》中指出,“彼之谋我,噬膏血非噬皮毛,攻资财而不攻兵阵……迫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他认为要真正富强,必须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列强。他说:“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哉!”。据此,郑观应提出他的制伏之法,就是“以毒攻毒”,以商战对之,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同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掠夺直接联系起来。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的内在联系,实际上是把经济安全置于国防安全基础的位置。在他之前的士大夫对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往往只看到了列强的船坚炮利的军事优势,对国门打开后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危害性未能引起注意。例如,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官僚无一例外地从军事

工业入手,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未向民用工业领域拓展,认为只要改进清军的武器装备就可以自强,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郑观应不同于洋务派官僚,察觉到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危害性,把经济安全作为一个紧迫的时代问题提出,显然有其进步性。

此外,郑观应通过对“商战”的表述,还扩大了国防建设参与主体的范围。他认为,国家的安危不仅取决于政府和军队,更有赖于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是全民族努力的结果,需要“士农工商”各个阶层投入,这样就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使这个口号不再停留在封建士大夫个人气节操守的抽象层面,转而为人人可以践行的实际行动。这种思想继续发展,开启了后来“实业救国”、“全民救亡”的先河。

## 二、工商立国、富强救国的综合国力论

在《盛世危言》里,郑观应明确指出,“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他提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口号。在他看来,讲求武备,必须保护工商,发展工业,扩大机器生产;兴学校,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货畅其流。只有国家的综合实力提高了,才能最终达到富强救国的目的。郑观应认为:“欲知商战,则商务得失不可不通盘筹划”。通盘筹划是郑观应商战思想的一个特征。郑观应的“商战”内涵非常丰富,农业矿业、机器制造、交通运输、外贸等均包括其中,不是就“商战”而言“商战”。他在《盛世危言》中,对农业、矿业、交通运输、机器制造,乃至银行、税收等都设专篇进行论述;还强调改革制度以扶“华商”,倡议广兴学校培养人才。这表明郑观应已经感觉到国家竞争力的组成是多元的,不取决于某一具体部门、行业的发展水平。这种认识与现代综合国力的观念比较接近。他在《盛世危言》中提及建设有经济因素、教育因素、政治因素等等,可见他是将国力的提升作为一个系统

工程来看,较之封建士大夫的“富国强兵”理论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综合国力论。

在强调通盘筹划的同时,郑观应还强调“国家欲振兴商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他认为决定竞争胜败的关键是在于能否制造出成本低廉的工艺品,振兴商务要依赖工业的发展,指出工业和商业二者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他认识到机器生产的强大威力,因而对中国不讲求先进机械技术,致使制造不如外洋之精,价值不如外洋之廉。郑观应指出,“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他对机器制造、技艺、格致相当重视,并提出要用购买和自造的办法发展自己的机器制造业。郑观应说:“商务之盛衰,不独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他认为,生产质优价廉的产品是与外国进行商战的重要条件。郑观应在这里提出的“工以翼商”,实际是指通过引进先进的科技手段来实现产业升级,从而突出了科技力的作用。

综合起来,郑观应认为工商业的振兴是国力建设的根本。衡量国力的强弱,不仅仅看军事实力的大小,经济实力是非常重要的指标甚至是国防力的基础。他强调实现工商业的振兴必须借助生产工艺、技术的进步,这类似于经济力、科技力是综合国力基础的现代思维。此外,郑观应的有关阐述还隐含了国家间的竞争是全面而多元的,与今天我们所说国家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相去不远。尽管受时代局限,郑观应的综合国力思想是朴素而原始的,未能进一步认识到生产技术背后的研发问题,但在一百多年前能摆脱传统道统对科技的歧视,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 三、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思想的萌芽

1. 国防建设必须基于国民经济发展。郑观应提出了“强兵之道,首在理财”的看法。他认为,解决防务危机,改进武器装备是必须的,但却不是根本。只有解决了理财问题,使财政宽裕,才能实现真正的强兵,这就初步产生了国家军事建设受经济基础制约的思想。他认为,洋务肇兴以来,“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搞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争不遗余力”,但对外战争中仍陷于失败→建设→失败的恶性循环,国家军事负担日趋沉重,防务形势日趋恶化,因此他认定“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纵观晚清军事发展史,不管是同治年间塞防海防之争、还是光绪年间的海军建设,都表现出由经济基础薄弱引起的财力捉襟见肘,以至最后甲午一战

使洋务派多年的经营化为乌有。这其中虽有政治制度因素,但国内工商业未获发展导致的工商税收短缺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晚清政府中央财政收入主要组成部分仅有传统盐税、田赋和海关税。盐税和田赋是自然经济产物,增长量有限,而海关税收又常因赔款和外债充作抵押。从一定意义上说,晚清军事近代化运动的失败是与国内经济发展形成了脱节,国民经济与军事经济形成恶性循环所致:因为防务压力迫使晚清政府建设近代化军事力量,财力不足通常通过举借债务解决,海关税收就成为抵押物。举借的外债起到一定启动作用后,后续资金又必须通过同样的渠道解决,海关税因之一再抵押,实际可用财源日趋减少。最终军事斗争的失败导致赔款问题,还是主要通过举债解决,由是进一步削弱了财源。因此在近代条件下缺乏发达的国内工商业,就没有稳定而丰厚的中央财政收入,政府就没有足够的国防建设资金,军事近代化建设就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郑观应看到了晚清军事与经济之间的这种恶性循环,认为要解决防务危机,必须从发展国内经济入手,而不能单纯就军事论军事,片面进行军队建设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种观点对现代军事力量建设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2. 发展国民经济不能忽视国防建设。郑观应强调“商战”的重要,并未忽略“兵战”的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军事征服与经济掠夺是交相为用、相辅相成的,其根本原则是“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因此,他对“兵战”问题也给予了相当多的论述。他认为“商战”和“兵战”的目的分别是“送穷”和“退虏”,这两个点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很重要。所以,郑观应强调练兵、制器的重要性,“内安外攘莫先于兵,整旅行帅莫重于练,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保民莫先于富国,保富莫过于强兵”。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着重阐述了他的海防、边防、江防、练兵、练将、水师、火器等“强兵”思想,并且把强兵同经济发展、政治改革、人才教育等问题联系起来考察。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郑观应已经初步认识到了国民经济与国防建设是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只有这两方面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机制,才能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两者如不能兼顾,可能两者最后都归于失败。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4-07-20

作者单位:军事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蒋仕民